

# 十八大後的中國社會更需要理論解釋

新华网  
WWW.NEWS.CN

編者按：我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媒體大會，認識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人，出版物包括四本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十八大”如期召開，胡錦濤總書記在以“堅定不移……”為題的報告中，再次重申中國的道路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與他本人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之間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明確這都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用“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突顯了堅持這條道路決不動搖的決心。

習近平在隨後的討論中進一步解釋說，黨的十八大“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着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

無論從哪個角度、以何種立場解讀，其結論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當前的“中國道路”，有着越來越強的自信、越來越硬的決心。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共產黨強大的自信和決心，主要不是源自于美好堅實的理論，而是來自于成功的實踐，近三十多年一直在進行的一種既成就了中國的崛起、又隨着中國崛起而不斷擴展的、全面且深入的政治經濟實踐。

有一種意見認為，在當今時代，沒有理論也是一種理論。特別是在否定那種一味追求

宏大、追求體系、追求完整的“現代主義”理論的意義上，“沒有理論”、“拒絕理論”甚至是更為明智、更符合時代精神的做法。

回溯歷史，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其實正是黑格爾－馬克思這一脈“現代主義”理論體系的信仰者和踐行者，從那個時代的“與時俱進”，到改革開放之後的“與時俱進”，的確也暗合了世界精神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過渡。

然而，這並不能作為思想探索和理論建設上無所作為的現成託詞。尤其是對於中國學界來說，其主要任務就是創造思想、建構理論，而不應只是順着實用主義權宜變通和解構主義語言狂歡的大潮隨波逐流、得過且過。

十八大召開前夕，我的好友寒竹發表的《中國社會的扁平化結構》一文，猶如一道閃電，再次嘗試打破目前關於中國道路政治理論上的混沌狀態。

在我看來，這篇文章是中國政治學界近年來罕見的一次突破，文中所建構的理論模型，具有極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其中一些甚至可視為“寒竹定理”的理論要素，不僅可以應用於解釋中國社會，甚至可以擴展成對整個人類社會作出解釋，具有一般社會學意義的“定理”。

其原創理論可以簡述為：中國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土地私有化運動、析產繼承制度

形成、以及郡縣制建立這三次重大歷史變革後，導致了貴族政治制度基礎的瓦解，提前進入了扁平化的平民主義社會。

扁平化社會結構，失去了靠血緣繼承維繫的貴族階層，平民主義盛行，於是，如何形成穩固的社會秩序成為最大的難題。中國古代社會通過“察舉”“徵闈”，並最終形成了科舉制度以選拔人才，人為製造出基于賢能的管理者階層。而儒學的產生，給貴族制度已經崩潰的平民社會提供了一套軟性的等級觀念，起到防止社會發生混亂和崩潰的作用。

在我看來，這可以成為理解中國社會之所以大大不同于西方社會和日本社會的關鍵。而僅僅因為儒教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學說就將極為平民主義的中國視為等級制社會，同時基於發生在貴族與國王之間的分權運動就將血緣等級制度延續長達兩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尊崇為平等自由的故鄉，用寒竹的話說，“對中西方文明差異的誤解莫過于此！”

更重要的，從這個理論中，不難推導出關於近現代中國的平民主義建國和平民主主義經濟體的相應理論，也不難建立起針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一政治表述的深層理論解釋。

將中國近現代歷史看成是中國原本就自成體系的平民主義社會，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發生的，從平民主義政治體到平民主義經濟體的宏大過渡過程。那麼，上述這些政治理論，無非是在這個過渡過程中分別或多或少適用於實踐指導、應對各種具體歷史環境的一些理論。

之所以完全不同于西方且獨一無二，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只是因為中國平民主義社會以及從平民主義政治體到平民主義經濟體這一歷史過程完全不同於西方且獨一無二。

而一旦發現了中國近現代政治理論與中國平民主義社會近現代歷史運動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也就理解了這些理論各自的合理性和適用性。

感謝寒竹的開拓性思想探索，十八大之後的中國社會，將越來越需要新的理論解釋。從扁平化平民主義社會這一理論假設出發，中國的原創政治理論建設，是可以大有可為的。文揚 2012年11月9日



## “後奧巴馬時代”中美關係將有新變數 中國的出口可能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1月跌落財政懸崖還有一些迴旋的時間和空間，民主和共和兩黨還有時間去磋商。同時，兩黨的有識之士都將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將為美國的經濟慎重考慮。

“最後會選擇一個折中的方法，因為兩黨這種僵持的局面對兩黨都會造成影響。

並且現在兩黨的政策都趨中，政策上共性可能會多一些，這樣更利于兩黨達成協議。”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採訪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外國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劉波博士說道。

路透中文網也稱，華爾街銀行、投資者和金融業遊說團體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即大選結束後國會將會達成一個短期協議，以避開財政懸崖的最糟狀況。簡而言之，他們相信國會將把問題再推後幾個月。

### 貿易保護

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內，對中國提起的貿易訴訟超過小布什執政八年多的總和。中國出口佔美國進口的份額也逐年下降，僅僅就大選以來，關於中國企業在美國受阻的新聞就不絕於耳。

據報道，9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簽發行政命令，禁止中國三一集團關聯公司羅爾斯在俄勒岡州一軍事基地附近興建4座風力發電廠。10月8日，美國國會衆議院情報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稱，中國華為和中興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建議阻止這兩家企業在美開展投資貿易活動。10月10日，美國商務部裁定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光伏產品存在傾銷和補貼行為，基本上為美國針對此類產品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掃清了道路。

而根據奧巴馬在大選中公佈的競選綱領稱，當選後將繼續強力創造就業。對此，黃日涵表示，在第二任期剛上任時，奧巴馬政府為了兌現選舉承諾，必然將強化解決就業問題，努力創造美國國內就業崗位，加強對美國製造業的扶植力度，這可能會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進而加重中國製造業的困境，中國的出口可能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同時，劉波認為，如果世界經濟還處於低迷期，美國的貿易保護會愈發加劇。中美貿易摩擦會更多，而且結構型的不平衡也會愈發明

顯。對於出口型企業而言，貿易保護主義無異於阻攔企業最重要的“攔路虎”，所以出口型企業在面對貿易保護主義時，應做好功課，修煉內功。黃日涵表示，企業走出國門，需要面對“投資法律風險、投資政治風險、貿易保護主義”三重的考驗。

“首先，應該加強學習WTO法律制度及國際貿易規則，積極參與技術標準、知識產權、耐孕率、胎兒保護、疾病治療、農業政策、國際貿易規則等領域的知識，並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的聯繫，在獲取信息、對外交涉等方面加強溝通協調，充分利用各自資源優勢，形成最大合力。而在遇到美國不合理的貿易保護強制性要求時，應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以求整合各方面技術力量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維護企業的正當利益。”

儘管如此，黃日涵對中美貿易還是持謹慎樂觀態度。“中美兩國之間已經形成特殊的相互依賴的關係，奧巴馬政府也不能完全不顧及中方的感受。儘管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難以避免，但兩國貿易總體上將保持穩定，未來如果美國經濟狀況好轉，貿易保護主義也將隨着下行。”黃日涵說。

### 重返亞太

曾有專家說，從2001年開始，中國贏得了一個“戰略機遇期”，因為美國在“9·11”事件後無暇東顧，重心放在了全球反恐戰爭中。但隨着本·拉登被擊斃，中東北非問題逐漸清晰，美國將有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亞太地區。

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受世界金融危機的牽累和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的影響，美國自身實力相對下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亞太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快速上升。劉波指出，對於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來說，更在意的還是遏制崛起國的快速發展，維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因此，如何有效的遏制中國快速崛起是終極目的。

之所以完全不同于西方且獨一無二，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只是因為中國平民主義社會以及從平民主義政治體到平民主義經濟體這一歷史過程完全不同於西方且獨一無二。

而一旦發現了中國近現代政治理論與中國平民主義社會近現代歷史運動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也就理解了這些理論各自的合理性和適用性。

感謝寒竹的開拓性思想探索，十八大之後的中國社會，將越來越需要新的理論解釋。從扁平化平民主義社會這一理論假設出發，中國的原創政治理論建設，是可以大有可為的。文揚 2012年11月9日

但是劉波指出，“面對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調整，中國既無需過于緊張擔憂，也不能掉以輕心，要在客觀評估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做出戰略應對。”

“首先要把握和理解好美國戰略東移的深刻內涵。美國‘重返亞洲’是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之後的快速調整，獲取經濟上的收益，維護美國經濟的穩定繁榮，是美國‘偏向’亞洲的重要原因，因而其戰略本身帶有防禦性特點。”劉波指出，具體到中美關係而言，雙方逐漸由“安全主導”型轉化為“複合依賴”型。在經濟領域，中美兩國的互補性大於競爭性，相互依賴主要體現為互補和合作。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斷拓展，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為中美加強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時至今日，中美利益交融合作共贏是雙方利益的需要。

